

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若干特性^{〔*〕}

郝亚明, 曾 醒

(贵州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特殊紧迫性和现实针对性,是牢固树立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思维的思想基础,是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认知关键。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民族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和民族工作的短板弱项可以作为系统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重要特性的四个切入点。历史必然性阐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根基,极端重要性明确既定道路的目标指向,特殊紧迫性揭示亟待面对的风险挑战,现实针对性框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重点。这四个重要特性关联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时代基础、现实基础、实践基础,并蕴含着指向明确、意行互联、协调统一的价值逻辑。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特殊紧迫性;现实针对性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3.00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性质和本质属性的把握,以此达成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

汪洋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总结讲话

中指出:“要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使之贯穿民族工作各领域全过程。”^{〔2〕}在2022年省部级干部民族和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要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特殊紧迫性和现实针对性。”^{〔3〕}就本质而言,这四个特性关联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时代基础、现实基础、实践基础。深刻认识这些重要特性是树立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思维和践行这条主线的思想基础,是完整准确全面把握

作者简介: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民族社会学研究;曾醒,贵州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的动力机制研究”(21&ZD212)的阶段性成果。

和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认知关键,是实现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结合“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从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极端重要性,从民族工作的短板弱项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针对性,从民族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紧迫性”^[4]的理论判断,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民族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和民族工作的短板弱项四个认识切入点系统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重要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内在逻辑。

一、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是社会实践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并起着支配作用的特性。^[5]其旨在揭示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呈现其不可遏制的客观趋势,并为作为承担者和主体的社会的人在历史可能性空间中发挥能动性、创造性提供可能。^[6]显而易见,历史必然性应当包含“活动承担者”和“可能性选择”的相关话题。据此,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须直面两个问题,一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实在性,二是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可能性。

中华厚重悠远的历史叙事孕育了自在的中华民族,近代在西方列强多重夹击和打压下孕育了自觉的中华民族。^[7]费孝通以自在和自觉梗概出中华民族形成的两个阶段,并以时间跨度指明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客观实在性。在这一大前提下,陈连开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可分为起源孕育、自在发展、自发到自觉联合三个阶段。^[8]旧石器时代到秦统一以前,有漫长的时代是中华民族起源孕育的阶段。自秦到1840年的两千余年间,分散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融合,出现相对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华

夏族,以及中华民族凝聚结合的核心——汉族,自在发展的主体基础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进一步夯实。伴随着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及国家机器的形成、巩固与确立,中华各民族共同祖国观念形成,各民族整体性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处于自在发展的历史阶段。但由于历代封建压迫统治及民族之间纷争隔阂的客观存在,严重阻碍了各民族对根本利益和整体联系的正确认识,故而未能形成整体性自觉意识。1840年后,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中华民族自觉意识被唤醒。在共同抵御外辱、共同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愈显强大,生命力更进一步迸发,感召力更进一步凸显。尤其是中华民族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于此进入自发到自觉联合发展的阶段。中华各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多元一体”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为彰显的结构性特征。^[9]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实在性又体现在其是各种纽带、民族要素汇集而成的历史合力。^[10]中华特殊的地理因素,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迁徙融合提供了环境基础。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经济因素,为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更大共同体奠定了物质基础。兼收并蓄、文明互鉴的各民族文化形塑了博古通今、悠远精深的中华文化,厚植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精神文化基础。共同的心理因素所催生的强烈认同感让中华民族愈发成为一个难舍难分、密不可分整体。同时,自古便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家底及“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共同串联起各民族对自我身份归属的审视和对国家合法性的理性追求。中华民族在历史互动和各要素交织影响下逐渐形成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基于共同体形成发展应当具备的各类要素的有机整合,以及因此种有机整合而呈现的结构性特征和社会功能不难看出,^[11]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要素条件进一步夯实了这一共同体实而又实的结构性基础。

以上探讨揭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凝结起来的若干共同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2]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赓续的共同财富。那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何如此强调中华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凝结的共同性特征？这还需要从民族与历史文化的深度关联谈起。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是指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尽管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更多被赋予政治内涵，但并非把民族的历史文化基础与之相割裂，而历史文化恰好是民族的根基与底蕴所在。“四个共同”从历史文化视角阐释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形成和发展，既包含历史过程也包含历史表现。更进一步说，这些共性特征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则就是中华民族这一有机整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正是基于这种各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特征，中华民族才能在对共有历史文化深度认知的基础上产生对共有未来命运的深度感知和强烈认同，才能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方略，无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的建设过程，还是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过程，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历史文化作为支撑和基础。“四个共同”揭示了各民族对中华疆域、历史、文化、精神等方面的特殊性贡献，在超越自身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整体性联结，并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蕴含着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丰厚资源与天然优势。这既契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属性的要求，也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历史基础所需的要求。

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时，首先应当摆正中华民族具有若干共同性特

征的历史基础地位，其意义就在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话语底气和历史依据，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对自我有更加清晰的认知，更加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继而朝着包容性更广、认同感更高、凝聚力更强的进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二、从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极端重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这是中华民族的最根本利益，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必然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目标指引。使命任务在新时代新征程这一背景下不仅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性，也突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虽有史来最接近，且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伟大复兴，但实现也绝非轻松快事，其过程必然充满各种艰难险阻，需要系统解决思想认识、社会基础、环境氛围、动能要素等诸方面的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为推进实现使命任务提供重要思想保证并为其保驾护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进实现使命任务的基础性工程，在全面推进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地位。故而应从时代基础出发，从其凝聚伟力、满足现实和理论需要三方面作用入手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极端重要性。

其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凝聚完成使命任务的磅礴伟力。极大程度上，凝聚各民族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认识，在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上汇聚更加强劲的中国力量是民族工作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使命。据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应当在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发挥统一思想、实现团结、汇聚力量的作用。统一思想是基础,引导各民族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力促各民族对现实和未来有共性认知评价和共善理性选择,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以此解决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过程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实现团结是要义,团结作为一种相互关系状态,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条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持续巩固我国民族关系向上向好,深层次营造团结奋斗、共圆梦想的环境氛围。汇聚力量是根本性作用,基于思想基础和团结状态的相互作用,才可能进一步汇聚起多方面的力量。伴随着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所汇聚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多方面,而且作用在多方面,这是全面推进完成使命任务最亟须的作用,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根本的作用。

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满足推进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的现实需要。于事物发展而言,目标清晰、动能得力、要素完备、范围限定是现实必要条件。换言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能契合而且能满足全面推进使命任务的现实必要条件。首先,从目标方向而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党的使命任务,也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目标,更是党的民族工作的时代要求。诸如“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等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相关联的内容正是对目标方向的明确。其次,从动能要素而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要求各民族必须团结奋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14]故而能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充分激发共同团结奋斗的动能,力促各民族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再次,从范围限定而言。一方面是场域限定,民族工作是“国之大者”,在民族工作领域要对推进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有所赋能,就必须坚持民族工作的主线毫不

动摇。另一方面是时间限定,“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划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限,伟大复兴正处于不可逆转的关键时期,世界局势也处在加速演进期,应当说在如此复杂的时期里,实现目标愿景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求更进一步凸显其极端重要性。

其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回应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的理论需要。汪洋在2020年全国政协民宗委主题协商座谈会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15]作为习近平总书记重大原创性论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纲”而上升为党的民族工作方略,是党和国家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现实需要而作出的理论回应。其理论意义在于,一是破除现实困境。于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而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族际之间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失衡等是其主要困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恰好能有效破除此困境,并在极大程度上实现各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平息政策争论。民族工作系统且庞杂,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差异性认识,并进而引发了关于中国民族政策治理成效与改进方向方面的一些论争。^[1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我国处理民族事务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内容,其提出与发展正好能平息对当前政策的争论。三是纠正理论偏误。长时间以来,学界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认识存在一些偏差与误解,诸如“内在冲突论”“求同否异论”“民族同化论”^[17]等理论误区的存在势必会影响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相关联的理论可以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纠正。

三、从民族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紧迫性

风险隐患是指某件事的负面效果发生的概

率、程度以及影响其概率和程度的不确定因素。而特殊紧迫性应当包含特殊性和紧迫性两个部分,特殊性是指事物特有的,有别于其他事物或一般情况的性质;紧迫性是时间管理概念,更多强调速度和效率。民族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是指利用所谓的“民族问题”危害社会和谐稳定,是破坏民族团结的若干因素和表象的集结,从根本上威胁着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此类风险隐患因领域范围的划定而凸显特殊,对其有效防范也因发展进程的需要而凸显紧迫。故而在特殊且紧迫的属性重叠下,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工作方略的特殊紧迫性愈发凸显。

我国民族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在结构上可分为内外两部分。国内的风险隐患一方面表现在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各民族对发展的强烈诉求与区域性发展薄弱之间的矛盾仍是一个长期性问题,因发展问题而连带出的风险隐患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各民族群众因思想观念、经济利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产生的矛盾纠纷与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冲突还时有发生,矛盾的上升、激化对社会和谐稳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再一方面,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复杂多样,局部地区反分裂形势依然严峻,附加着其他风险因素的交织,成为我国民族领域内部最为关键的风险隐患。外部风险可以概括为“一个头目、两大手段、三股势力、四个图谋、五大切入口”。简言之,即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操纵影响下,其惯用干扰破坏和渗透颠覆的伎俩,利用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妄图瓦解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妄图解构中华文化,并以民族边疆地区、落后贫困地区、宗教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人权领域等为切入口企图打通内外渠道,进而达到其目的企图。外部的风险隐患被视作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恶性肿瘤”,其最大毒性在于阻碍族际政治整合,致使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削减、良性的族际政治互动打破、加速民

族的政治分离。^[18]诚然,将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概而划分为内外两个部分虽存在一定的理论欠缺,但如此划分的意义就在于能更清晰地还原内外风险隐患相互关联的本真。通过美国等西方国家操弄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等议题的轨迹不难发现:以民族、宗教、意识形态与人权等作为问题窗口,为他们提供撬开操纵图谋总开关的机会。这些单个问题抑或问题之间存在着因与果、内与外、前与后、表与里的关联。同时,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搜集传递系统更新迅速的今天,此等关联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了防范化解的难度系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抵御风险隐患的压舱石,其兼具“解决内部问题,迎接外部挑战,^[19]协调内外差异”的多重意义,理应是应对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的根本性事业。对此,我们应当清晰地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三重作用向度。

一是对外层面的有效阻隔。“边界”是具有地理、历史、心理等属性的“区隔”性概念。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具有政治属性的地缘空间和具有延续性的历史文化是区隔内外的条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划定内外边界的基础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基于政治性地缘空间和特定历史文化而夯实划定内外的基础力量,进一步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产生认同和想象。当内与外有效地区隔后,源自于内部的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则会对外部世界有一定的选择性,即趋利避害的判断与选择。故而在面对来自外部的渗透、颠覆、破坏等风险隐患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就成为防范抵御的内在性基础力量。

二是对自我层面的有效保护。在民族意识的话语体系中,“自我”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身份认同,只有在自我层面形成认同意识,才可能完成自我保护的使命。身份认同意识是实现自我保护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意识,其实现自我层面的保护一方面要依托于意识主体从个体身份上升为集体

身份,实现自我身份范围的超越;另一方面要在“他者”的对比下进一步强化自我身份,进而为自我保护提供契机。制造身份认同危机是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最为致命也最为通用的伎俩。“铸牢”的过程是在实现主体身份范围超越的前提下强调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归属和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出具有“防护膜”般的身份认同,故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消减风险隐患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从本体角度保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不受影响、不被利用,同时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实现民族社会结构和谐稳定。

三是对内层面的有效凝聚。外因总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内与外是相对概念,基于民族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内和外的区别极大程度上框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凝聚功能的范围和对象,其凝聚的范围是以国家领土为边界的内部空间,而对象则是具有诸多共性特性且有别于“外部”的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内在凝聚力是其存续与发展的纽带与支撑。^[20] 面对民族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引导各民族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才能彰显出国民共同攻坚克难的集体行为能力,以此凝聚起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的磅礴力量。

四、从民族工作的短板弱项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针对性

现实背景往往为认识与实践提供宏大的叙事空间。民族工作的短板弱项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呈现或应对必然存在一定的现实背景。故而从民族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针对性首先应当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现实背景,只有基于对民族工作现实背景的深刻把握,才能清晰地认识民族工作短板弱项的内涵实质,才能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基础,才能更加凸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现实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时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作为国家发展目标,在对社会各层面发生牵引性影响的同时,赋予各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对民族工作创新推进的新期待。二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现实发展与生活需要之间的内在协同性对各领域工作提出新要求。由此,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基点。三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险挑战期。既要沉着冷静处理好外部机遇和挑战,也要守正创新解决好内部问题,这明确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要求。多背景共塑和多要求叠加不仅决定了民族工作在整个国家战略全局中的核心变量角色,而且决定了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战略意义,还决定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在此背景下存在诸多与时代发展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适应问题的客观性。

我国民族工作的短板弱项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深层性特征。其一,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配置的效率质量和范围主体提出新要求,各民族相互间的大流动和地域间的大融居成为新阶段特征。民族之间的各种联系更加紧密,以往以聚集地为主的民族工作方式显然不适应各民族在全域范围内配置资源这一新阶段特征,由此暴露出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力度与方法有所欠缺、建设与新时代相匹配的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方面着力不够等问题。其二,民族多样性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多样性时常伴随着差异性而普遍存在,更进一步说,差异性也伴随着矛盾而普遍存在。那么,对这种矛盾的认识与对待就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观或放大的文明观的问题。^[21] 故而在认识和对待此矛盾时,出现了在彰显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差异性的同时,未能平衡好与一体性共同性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既牵涉共同性

和差异性的关系,也牵涉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三,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多强调脱贫致富的硬性指标,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故而存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未能正确把握的问题。其四,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策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应当兼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维度,其不仅要求注重氛围的营造,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基础的建构。但现实中仍存在注重营造民族团结氛围而忽视建构民族团结基础的问题。此外,在民族工作现实推动中,也存在着诸如体制机制、人财物等方面的短板弱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匹配、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愈发成为影响中国道路和中华民族行稳致远的重要原因,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巩固与拓展。基于此,在消弭与时代要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适应的诸多问题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兼具问题框定性、方法回应性、实践指引性。

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其提出与推进是现实问题驱动的必然结果。就本质而言,这关联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框定性。本着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论话语上升为政治话语,不仅是党中央基于民族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阶段特征所作出的刚需性回应,而且是直指当前民族工作的问题症结。这一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揭示了诸如“五个并存”“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失衡”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靶向问题,从此意义上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与演进极大程度上就框定了当前我国民族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从框定问题开始,这一政策议程便具有了现实落脚点。

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最大的哲学意义就在于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从“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的论断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无疑是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的方法论的根脉所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要正确把握“四组关系”,对这些理论建构和实践推进的关键性问题的回答必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强调理论建构与实践推进时更多应彰显其方法回应性的现实意义。

再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重心在于实践推进,故而在消解民族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过程中应当明确其实践指引性。从实践推进的角度来看,消解短板弱项无疑是重要的实践目标。与此同时,清晰精准认识民族工作短板弱项才能够明确实践重点。当实践目标与实践重点相契合并上升为较高层次的国家意志时,一方面能够确保在实践推进过程中不至于出现目标偏差,另一方面能够确保民族工作在协调统筹各方过程中不至于出现重点偏离。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推进过程中,民族工作的短板弱项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两个问题流向,即是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补齐短板弱项,还是通过补齐短板弱项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主线地位和“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掷地有声地引正了问题流向,即补齐短板弱项就必须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工作主线。基于以上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有效引正实践推进过程中的问题流向,并实现推进目标和重点的正轨化。

五、结 语

基础议题是建构理论话语体系的必要组成,对基础性议题进行探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影响着建构理论大厦的扎实性与稳定性。换言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重大原创性论断,对其基础性议题的把握与探讨,不仅影响着这一重大论断所承载的话语高度,也影响着实践的推进深度,还影响着理论的供给厚度。所以,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诸如本质特征、基本

属性等议题的研究就成为回答话语建构、实践指导和理论供给之间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断从提出到演进至今已近十年,学界在内涵、功能、背景、基础等方面的探讨取得了诸多实质性的成果,但与此同时,话语重复、理论欠缺、内涵模糊、外延泛化等基础不牢的事实同样存在。因此,重新审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基础议题在当下依旧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若干特性的探讨,因作为基础议题而彰显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特性的同时,这些重要特性也承担着夯实基础的使命。基于上文,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脉络中找寻到了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历史依据;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中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作用与极端重要性;从揭示内外风险隐患认识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紧迫性;从民族工作短板弱项的具体表现和成因认识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针对性。这“四个重要特性”蕴含着指向明确、意行互联、协调统一的价值逻辑。其一,“四个重要特性”均有清晰的指向,历史必然性阐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根基,极端重要性明确既定道路的目标指向,特殊紧迫性揭示亟待面对的风险挑战,现实针对性框定高质推进的着力重点。同时,“四个重要特性”也有共同的指向,即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二,“四个重要特性”的内在意涵与行动追求是相互联动的,这是“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的内在要求。内在意涵和行动追求很大程度上互为表里,没有对内在意涵的深刻理解就不能有清晰有力的行动追求,同时没有清晰有力的行动追求也不可能对其内在意涵有深刻理解。其三,“四个重要特性”虽分属不同板块,但就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而言,四者是协调统一的关系,这是新时代民族工作与

民族事业整体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注释:

-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 [2]《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 [3]《汪洋与省部级干部民族和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学员座谈》,《人民日报》2022年7月16日。
- [4]尤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科学指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求是》2021年第21期。
- [5]方军、刘奔:《实践·历史必然性·价值——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辨析》,《哲学研究》1993年第11期。
- [6]刘曙光:《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及其复杂性》,《湖湘论坛》2009年第3期。
- [7]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 [8]陈连开:《中华民族之含义及形成史的分期》,《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
- [9]刘正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 [10]杨须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铸牢》,《人民论坛》2022年第10期。
- [11]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个维度》,《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 [12]《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 [1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
- [14]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
- [15]《汪洋出席全国政协民族委主题协商座谈会》,《中国民族》2020年第12期。
- [16][17][19]郝亚明:《从政定位来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8期。
- [18]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 [20]严庆:《在应对疫情中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民族论坛》2020年第1期。
- [21]郝时远:《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中国民族》2017年第5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